

婚姻暴力與社會支持之探討

陳源湖

壹、前言

婚姻暴力 (marital violence) 在十九世紀就是一個受重視的社會議題，但受限於傳統觀念對家庭所抱持的正向觀點，往往將婚姻暴力視為「家務事」，而將其邊緣化 (王麗容，民八四；黃怡瑾，民九〇)。婚姻暴力私領域化的結果，不但阻礙了對此一議題的研究方向，影響我們對婚姻暴力議題的認識，也隱瞞了婚姻暴力確切的發生率。即便在家庭暴力防治法公佈實施 (八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後，雖有多於以往的受虐者勇於走出受虐情境，但在父權社會的結構下的性別意識型態、權力及社會支持系統不完備之下，卻仍阻礙了相當多的受虐個案無法脫離受虐情境，甚至因而對受虐婦女產生所謂之「責備受害人」(blame the victim) 的不當觀點。

多數女性成為婚姻暴力事件中的主要受害者，乃是中外皆然的

現象。在一些古老的文化中，認為殺妻的行為是合法的；而在希臘、羅馬等國中，則認為丈夫有權殺死不貞的妻子，而其行為是可以被原諒的；在孟加拉被謀殺的女性中有五〇％是慘遭丈夫的毒手；一九八七年加拿大被殺害的女性中，則有六二％的人是死於親密男性伴侶的手中；在美國平均每天有四位女性死於男性伴侶手中；在辛巴威高等法院所處理的謀殺案件中，超過六〇％是屬於家庭殺人案件 (Rude, 2000)。

婚姻是人類社會最複雜與矛盾的一種關係 (謝臥龍，民八二)。當這種關係有所衝突發生時，何以兩造關係人忘卻當時的婚姻承諾，而多選用非理性的威脅、咒罵、虐待、控制等暴力行為做為解決衝突的手段呢？事實上，上述的手段是男女雙方均會使用的方式，但為何在婚姻暴力議題的研究中，多數的受虐者又多為女性呢？根據女性主義的觀點，婚姻暴力中的施虐者大多數是為男性 (Martin, 2000)，尤其是受虐者多數為女性時的婚姻暴力情境中，顯然與父權社會中的性別意識型態與權力運作有密切關係 (Walker, 1979; Martin, 1976; 周月清，民八四；劉秀娟，民八七)。而 Dasgupta

和 Warrier (1996) 指出，許多學者 (Bograd, 1988; Dobash & Dobash, 1979, 1992; Straus, Gelles, & Steinmetz, 1980) 認為虐待妻子一事，乃是父權社會結構中不平等性別關係運作下的產物。而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受虐婦女的存在無疑是社會整體性別權力結構失衡所產生的社會問題 (黃怡瑾，民九〇)。換言之，女性受虐與不平等的性別權力位階有其相關存在，性別權力位階愈不平等，婚姻暴力的發生就愈頻繁 (Dasgupta & Warrier, 1996)。

國內外相關研究指出，婚姻暴力發生與社會支持獲得程度有關。亦即婚姻暴力女性受虐的情形，除前述之文化性別因素外，亦與社會支持的不足是有關係的。受虐婦女能否順利脫離婚暴的情境，進而終止受虐關係，與其本身能否獲得充足的社會支持有關 (Dibble & Straus, 1980; Dutton, 1988; Hampton et al., 1999; 陳婷蕙，民八六；湯琇雅，民八二)。

據此，有關婚姻暴力受虐婦女的協助，實無法忽略社會支持的建置，舉凡立即性的通報、緊急救援、庇護安置、法律協助、心理輔導、醫療，甚至是就業提供，均為社會支持應含括之層面，以期發揮完善社會支持效果，協助婚姻暴力受虐婦女脫離受虐情境。

貳、婚姻暴力的定義與原因論

婚姻暴力議題的研究在臺灣約三十年的期間，當此議題從私領域中逐漸提升到社會問題的層次時，代表著大眾對此議題重視程度的提高，也代表了實務界與學術界長期對此議題所累積的工作與研究成果，促使社會正視婚姻暴力不單只是「家務事」，而是一項嚴重的「社會問題」(Martin, 1976)。

一、婚姻暴力的定義

婚姻暴力是家庭暴力 (family violence or domestic violence) 中的常見形式之一。有關婚姻暴力的概念和定義，除了廣義和狹義的界定之外，當事人對於暴力行為主觀及客觀的認定，也會對「婚姻暴力」有不同的解釋。陳若璋 (民八三) 指出：「婚姻暴力是指配偶之一方遭受到另一方以言語、肢體、性等方式的虐待。」就此定義中的虐待行為則分別涵蓋了二個層面：一、生理傷害：例如，摑打、踢、揍、掐或使用器物傷害或被迫性行為；二、心理傷害：例如，言語恐嚇、威脅。

丁雁琪 (民八五) 認為婚姻暴力的定義宜採取廣義的解釋，亦即除了肢體的暴力行為外，更包含了虐待關係。也就是說，親密關係的雙方，經由權力的濫用而造成對方在身體上、心理上及精神上的傷害。

美國婚姻暴力研究者 Walker (1984) 指出：「受毆 (暴) 妻子就是指重複受到任何男人，施以任何身體或心理強力 (forceful) 行為，用以強迫妻子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而毫不尊重妻子的權力。」

PageLOW (1984) 的研究中對受虐妻子的定義則以「身體傷害」為核心概念，他說：「受暴妻子是指妻子受到故意的身體傷害，以致於產生痛苦或受傷，或被先生（或有深度關係，如性關係的男伴侶）強迫或限制其自願性行為者」。依此看法，PageLOW 認為這種施暴是一種對人身的侵犯，而且是一種單向的施暴行為。

Schecter 和 Ganley (1995) 指出：「一個相當有名的婚姻暴力定義：指成年人或青少年對其親密伴侶所採行的一種攻擊與強制行為，其型態包括身體的心理的及性方面的攻擊以及經濟上的強制。

法官高鳳仙（民八三）對婚姻暴力的定義則採用廣義的角度解釋之：「婚姻暴力係指在婚姻中所發生之暴力行為而言。而關於暴力行為的定義，係指恐嚇、傷害、強姦、妨害自由、毀損器物、不法之侵入、跟蹤、辱罵、或妨害自由等行為。」

黃富源（民八三）認為：「婚姻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中之夫妻間，所發生的口頭上或身體上的攻擊或惡意的疏待行為。」

綜合以上的說明可知，在「婚姻暴力」定義的界定上有其模糊之處。誠如上述，當事人對於暴力行為的不同認定，均會影響對婚姻暴力的解釋。而形成此現象的原因之一，在於對於「暴力」一詞的定義和指標，並沒有齊一的標準；再者，涉及個人主觀感受不同，亦使得「婚姻暴力」的定義困難。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婚姻暴力的調查統計數字，並非代表此類事件的確切發生率，亦即，調查統計數字與婚姻暴力的事實之間其實存有落差。

二、婚姻暴力的原因論

黃富源（民八三）對婚姻暴力提出四項解釋的觀點，分別是個入特質論、家庭因素論、社會結構論與生態系統論。在個人特質論的觀點中，主要認為婚姻暴力的問題源於個人的病理問題，而女性則應該為引發婚姻暴力負責，相關的治療與處遇服務皆以協助受虐者「適應」受虐環境，此論點展現出父權體制下的性別意識型態，亦因此而更加鞏固婚姻暴力中「男性為尊」的性別意識型態及權力運作；在家庭因素論中，則將婚姻暴力發生的原因隱埋在家庭的框架中，企圖以家庭失功能的形象掩蓋造成婚姻暴力發生的重要因素——性別權力的不均。換言之，在視婚姻暴力中男強女弱的性別權力為理所當然的同時，往往忽略受虐婦女的主體性及婚姻暴力中的性別權力面向，反而模糊了婚姻暴力議題的焦點（黃怡瑾，民九〇）。

在社會結構論中，婚姻暴力的發生必須強調社會文化與制度的影響。換言之，以往強調的個人特質或家庭失衡等解釋觀點，並無法鉅觀的解釋婚姻暴力的發生，反而仍將婚暴議題侷限於「私領域」（個人、家庭）的解釋範疇，而無法提升至「公領域」的探討層面。因此，探討婚姻暴力的發生必須嚴肅的面對結構壓力與文化對暴力規範失當的處理，以呼應「婚姻暴力乃是社會問題」的觀點。

在生態理論中，則漸趨於以整合的系統與生態網絡的觀點來解釋婚姻暴力的發生。Carlson (1984) 提出解釋家庭暴力的生態學架構，分別從個人、家庭、社會結構及社會文化等四個不同的社會系

統加以解釋，每個層面的因素，都相互影響著婚姻暴力行為的發生。根據 Carlson 所提出的此一架構，可以清楚地看到婚姻暴力絕無法脫離社會文化的影響。在婚姻暴力的論述中，更應時刻地對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加以檢視，舉凡文化價值觀、信念、性別角色的社會期待等等，逐一反省其對婚暴行為發生的影響，以期大眾對婚姻暴力的本質能有更清楚的認識。

有關引發婚姻暴力的原因之探討，從早期偏重個人因素的解釋，到近來則偏重在社會文化層面及生態學層面的解釋 (Dutton, 1988)。茲將其內容分為個人因素論、人際互動層面理論、社會文化層面的解釋及生態學的解釋等四部分，說明如下：

(一) 個人因素論

此派學者認為婚姻暴力之所以會產生，主要是因為施虐者及受虐者本身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異常所致。其中最著稱的觀點即是佛洛依德對虐待狂與被虐待狂的解釋。虐待者因不可控制的驅力而產生虐待行為；而被虐待者在潛意識中，則是喜歡這些行為 (呂寶靜，民八二)。

黃富源 (民八三) 也指出，引發婚姻暴力的個體之負因中，可分為 (一) 人格特質缺陷，如：低自我控制、低自尊、不成熟、或其他精神心理障礙；(二) 個人社會技巧低劣，如：溝通技巧、抗壓能力及人際關係處理均不佳；(三) 個人劣習，如：酗酒、藥物成癮；以及 (四) 生活窘境：失業、經濟困乏。由此可知，此派學者強調婚姻暴力的發生，多源自於施虐者與受虐者的人格傾向異常。

(二) 人際互動層面理論

上述強調個人因素的婚姻暴力解釋理論，並無法完全解釋婚姻暴力發生的原因。因此，部分學者從社會心理學的理論，加以瞭解個人與其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亦即從人際互動的層面去解釋婚姻暴力產生的原因。茲將四種屬於社會心理學的解釋觀點，說明如下：

挫折—攻擊論

婚姻暴力的發生，源自於個人所欲追求的目標受到阻礙而無法順利達成時，便轉而使用攻擊的行為來表達其挫折感。

社會學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婚姻暴力的發生，提供了一個學習的榜樣。周月清 (民八四) 認為，社會學習是受形象 (symbol) 的影響，學習者會從榜樣身上學習到攻擊女性的方式，也就是說婚姻暴力的行為是學習而來的。沈慶鴻 (民八六) 的研究結論指出，父母婚姻暴力成長下的目睹子女，具有同性學習的傾向。尤其在女性目睹子女的身上更為明顯，且較易涉入父母的暴力衝突中，對自己本身也有較多負面的看法，從他們身上可以明顯地看到女性 (女兒) 向女性 (母) 學習的現象。因此，當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看到父親虐待母親的方式，長大後遇到相同的情境時，便以最熟悉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而形成一種代間傳遞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的現象。因此，社會學習理論也成為解釋婚姻暴力行為代間傳遞的重要依據。

衝突理論 (Conflict theory)

呂寶靜 (民八一) 指出，衝突理論認為衝突是任何統治關係中

所不可避免的。當家庭成員追求自己利益而導致衝突發生時。暴力即可被當作解決衝突的手段，亦即是一種結果。

符號互動論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此一理論主張個人的行為是經由對他人行為解讀後的反應。因此，婚姻暴力的發生，是因為夫妻雙方對彼此行為的誤解所導致的後果。

(三) 社會文化層面的解釋

Rollio May 於一九七二年指出，暴力和傷害僅僅是社會的錯誤徵狀，而非疾病：真正的疾病是因為缺乏權力 (Jerry, 1992)。Dobash 等人也指出：「在西方社會中，對妻子施暴的男人，實際上是與文化的觀念共存的。攻擊、男人的統治與女人的服從，以及使用身體暴力，都只是在增加權勢而已。」(Dutton, 1988；引自湯琇雅，民八二)。傳統父權結構的社會中，女人居於附屬的地位，社會學理論在一九七〇年代所發展出來對虐妻行為的解釋中，認為在男性為主的社會統治中，虐妻行為是社會規則所衍生出來的行為，而此行為則是被社會大眾所認可的，如同：「我們的社會實際上存有一種規則與價值觀，就是把結婚證書當成一張挨打證書 (hitting license)。」

在臺灣的社會中，把婚姻暴力視為個人的「家務事」，外力無需介入亦無法干涉，認為先生教訓太太是合理的；而且是太太的表現不佳，才引發先生的暴力相待。這些觀點，充分說明一九七〇年代社會學觀點對虐妻行為的解釋。而施虐者在這個觀念的影響下，使得他們在使用暴力的同時，將錯誤行為加以「合理化」，而且沒有產

生罪惡感，亦助長了婚姻暴力的持續發生。

(四) 生態學的解釋

針對婚姻暴力發生的原因多偏重於單一因素，而無法對婚姻暴力發生的原因做一周延解釋的情形，Carlson (1984) 提出解釋家庭暴力的生態學架構，分別從個人、家庭、社會結構及社會文化等四個不同的社會系統加以解釋，每個層面的因素，都相互影響著婚姻暴力行為的發生 (引自周月清，民八四)：

個人：包括個人的家庭背景、人格、世界觀，及其是否具有酒癮的習慣。

家庭系統：指個人所處的家庭動力、角色扮演、互動模式、夫妻關係與親戚關係對暴力發生的影響。

社會結構：指個人所處之社會的經濟狀況、趨勢、鄰居特質、工作環境、社會價值觀，以及有關法治的實施。

社會文化：強調個人所處之社會環境的文化價值觀、信念、社會標準 (例如：對性別的看法、是否接受暴力行為、是否有固執的角色認定、對家庭夫妻角色是否有偏差認定等) 對婚姻暴力發生的影響。

參、婚姻暴力的影響

婚姻暴力所引發的家庭危機，對整個家庭所造成的傷害相當大，而每一位家庭的成員都將陷於恐懼、不安、沮喪的氣氛中，社會更可能為此付出相當大的「社會成本」。究竟婚姻暴力所造成的影響有哪些呢？陳若璋（民八三）指出，婚姻暴力對家庭的影響，可分為下列三個層面探討，一、家庭層面，二、受虐者層面，三、子女層面。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婚姻暴力對家庭關係的破壞

在發生婚姻暴力的家庭中，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家庭和諧關係的破壞。因此，造成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惡化、破裂，而無法和諧的互動，並使家庭喪失了「情感支持」的功能。在這樣的情境下，不僅家庭成員的人格難有健全的發展，更使得人身安全遭受到威脅。

二、婚姻暴力對受虐者的影響

婚姻暴力對受虐者的影響，可分為生理的影響及心理的影響。生理的影響，例如：明顯的外傷、身體機能的損壞，或是出現所謂的身心症狀，而更嚴重的結果便是死亡；在心理影響方面，受虐者常出現緊張、焦慮、沮喪、喪失信心、自卑感或是悔恨等現象，甚至出現厭世的念頭。

根據研究指出，遭受丈夫毆打的婦女會產生所謂的「被毆婦女症候群」(Battered Woman Syndrome)（註：在婚姻暴力中，雖然大多受害者為女性，但亦不乏男性受害者。研究婚姻暴力的專家為求

其涵蓋層面較廣，多已將「被毆婦女症候群」改為「被毆配偶症候群」(Battered Spouse Syndrome))。此外，Walker (1979) 運用社會學習理論在受虐婦女身上，認為有些被毆婦女在屢次求援無效之後，則會完全放棄反抗或自衛，產生所謂的「習得性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

三、婚姻暴力對子女的影響

黃富源（民八三）指出，家庭中的暴力是會隔代傳遞的，這些身受家庭暴力殘害、或目睹父母間暴力的當事人，不但是顯現出許多的行為問題，而且極易轉變成另一個對他人實施暴力的加害人。

陳若璋（民八三）指出，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在其人格特質上極易具有下列的特徵：（一）具有評價較低的自我形象，認為自己無法保護被虐（父母），進而否定自己的能力及存在的價值；（二）對他人缺乏信任感，無法與人親近；（三）在人際相處上，容易產生被拒絕感；（四）挫折容忍力及自控性均低；（五）對人際關係有偏差的想法，認為別人對自已好，通常是有目的的；（六）人際溝通技巧較差、脾氣暴躁、具攻擊性，傾向以暴力解決問題；（七）有極度神經質傾向，容易緊張、焦慮、常常覺得沮喪或哀傷。

在婚姻暴力事件中，子女所受到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問題。這些子女除了在生理、心理遭到傷害外，更嚴重的是「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現象的產生。因此，導致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在面臨挫折的情境下，男孩通常會以暴力解決問題，女孩則學會以

容忍的態度來面對挫折。沈慶鴻（民八六）的研究結論更指出，婚姻暴力的目睹子女具有同性學習的傾向。可惜的是，在婚姻暴力問題的處遇上，我們都極容易將焦點放在施虐者及受虐者身上，而忽略了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處遇問題。

綜合以上所言，婚姻暴力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此外，我們更不可以忽略婚姻暴力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家庭的破碎、目睹暴力兒童的心理重建及輔導，在在都需要付出極大的社會成本。也因此，婚姻暴力的問題，絕不是單純的家庭事件，而是整個社會所應共同重視的社會問題。

肆、社會支持的概念

在暴力的循環中，我們也許會有疑問：為何受虐婦女不離開施虐者呢？事實上，根據筆者（民八七）的個案訪談中得知，受虐婦女無法離開施虐者的原因相當多，主要是因為缺乏有力的社會支持，導致個案的擔心和遲疑（例如：子女的監護權、居住處所、財產的分配、甚至是無法獨立謀生等）。因此，即使受虐婦女開始尋求協助時，顯現出強烈的離去動機，一等到情緒稍加緩和，暴力情境略有改善，加上現實壓力的考量，這些個案的離去決心便開始動搖，終究無法離開施虐者。

「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對於個人身心適應的正向效果，獲得極大的重視與支持。對婚姻暴力受虐婦女而言，社會支持的獲得更是協助個體度過難關、朝向更積極正向成長的動力之一。但是有關社會支持的定義，由於不同的探討角度，形成相當多不一致的看法。

一、社會支持的意義

根據 Henderson (1977) 指出，每個人都存有與他人建立良好且正向關係的需求；Cobb (1976) 也認為，每個人都需要與他人建立良好關係之社會連結 (social tie)，並相互關心、照顧與親密。可想而知，當一個人在面臨壓力的情境下，尤其是婦女遭受婚姻暴力的不幸中，這些關心、照顧等等，對她而言就是一種「社會支持」的方式。

Caplan (1974) 指出，社會支持是指重要他人對個體心理資源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的協助及情緒的支持。這些重要他人不僅分擔工作任務，並提供個體額外的經濟、物質、技巧及認知上的協助，使個體增加適應環境的能力。

Lin (1986) 對於社會支持的定義如下：由社區組織、社會網絡和信任夥伴所提供可觀察或實際的工具性和表達性的協助（引自鄭麗珍，民七七）。單小琳（民七七）則認為「社會支持」是由「社會」和「支持」兩個概念所組成。「社會」係指個人所處社會環境中的人、事、物；「支持」係指有關情感性和工具性的支援活動。井敏珠（民

八一)則指出,所謂的「社會支持」是個體透過與其周遭的任何人、有關的社會機構的成員的互動過程,在情緒上、實質上或訊息上所獲得的支持、回饋,使個體增進適應或問題解決的能力。

由以上的說明可知,有關社會支持的定義,並沒有一致性的說法,而其型式通常可分有形(tangible)與無形(intangible)兩種,前者像是物質或金錢的支持;後者則包括鼓勵、打氣、嘘寒問暖、愛及情緒上的支持。就其功能而言,不僅可以預防危機的產生,對於減少危機影響的程度,也有一定的功能。

二、社會支持的內容

Cobb (1976)將社會支持分成情緒支持、自尊支持及社會網絡支持(network support)等三種方式,分別為情緒支持、自尊支持及社會網絡的支持(network support)。Cobb認為社會支持是個體自我知覺到與自我相關的訊息,亦即個體自我知覺到廣受支持的經驗,而非一種個體與外在客觀環境的互動歷程。因此,社會支持必須是使個人相信自己是被關懷和被愛的;引發人相信自己有被尊敬和有價值的訊息;引發個人相信自己屬於相互溝通和互惠的網絡中。

以鉅觀的角度來看,社會支持的連結,應成為一個網絡。所謂的「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是以個人為中心,與其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單位、機構所組成的連線,而連線的組合,便形成所謂的社會網絡。

Schaefer、Coyne 和 Lazarus (1981)則將社會支持統整為三個要素,分別是情緒性支持:包含了親密和一種心理的再保證。實質性支持:給予個體直接的幫助或服務。訊息的支持:提供個體解決困難的訊息、建議並給予其行為的回饋。

Caplan (1974)則動態歷程的觀點為主,認為社會支持系統是一種持續不斷的社會聚合(social aggregates)歷程,同樣透過互動的模式,不斷與他人、社交網絡或團體組織接觸,進而獲得回饋、肯定的支持力量。

Cassel (1974)則認為,良好的社會與人際關係可以提昇個人的健康,而好的社會支持則能夠保護個人免於生理及心理上的傷害,並可減低個人與環境壓力源(stressor)之接觸,促使個人保持身心的健康。

Dean 和 Lin (1977)、Thoits (1982)則從情緒性支持(emotional support)及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兩個概念探討「社會支持」,前者包括情感上的關懷、傾聽及溝通;後者則指實務上的配合、協助及服務。

三、社會支持的來源

在探討社會支持來源的分類,主要是希望瞭解不同的支持來源所造成的不同影響。Cassel (1974)以互動的內容來定義社會支持,認為社會支持是指「由家人、親友、同事、鄰居所集合而成的次級團體給予個體的回饋,以協助個人修正行為、認知和情緒上的偏差。」

在此定義中，明白指出社會支持的來源來自於「家人、親友、同事、鄰居等集合而成的次級團體」。Thoits (1982) 亦提出相同的看法，認為個體社會支持的獲得，主要是由初級團體中的成員所提供。

Bennett & Morris (1983) 則將支持系統依來源分為（轉引自王淑芬，民八〇）：

（一）初級支持系統（The primary support system）：指由家屬、朋友和認識的人透過接納、服務和情緒支持，以幫助個人維持生活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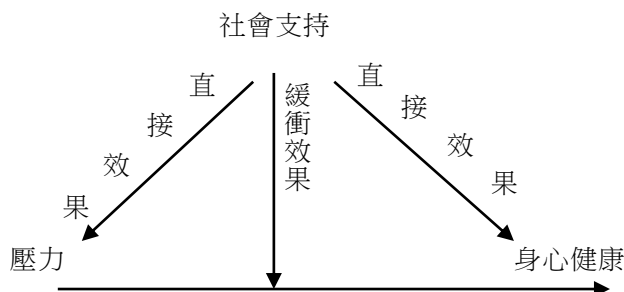
（二）次級支持系統（The secondary support system）：指由非私人所組織的正式支持系統，如醫療機構、社會團體、宗教機構等。

Dean & Lin (1977) 則認為家庭成員是最主要的支持來源，主要是因為：（一）家庭強調相互的責任關係及關懷、照顧；（二）家庭能給予個體彼此的強烈認同（identification）；（三）家庭視個人為獨特的個體，不以其表現來評斷個人價值；（四）家庭提供個體直接的互動及溝通；（五）家庭擁有極高的親密度（intimacy）；（六）家庭擁有緊密的結合（bonds）和關聯（association）；（七）家庭可以提供支持、安全、情感的環境。

McCubbin, et al., (1980) 更清楚的界定社會支持是由教堂、紅十字會等服務性機構所提供的經濟補助、暫時性的房屋借住等（轉引自王淑芬，民八〇）。

綜合上述，社會支持的來源，除了初級支持系統的提供之外，

更應涵括次級支持系統的內涵。尤其對受虐婦女而言，往往更是需要「次級支持系統」的介入，以便更有力的協助其解決婚姻暴力之問題。



圖一 社會支持的效果模式
（引自 House, 1981）

四、社會支持的效果

有關社會支持功能的探討，多為強調社會支持可以增進個人處理及克服生活上的緊張和挑戰，以提高個人的生活適應能力。這個「支持」也像是與一個或多個重要他人及團體的持久性、連續性的關係。藉由這個關係，可以幫助個人處理生活上所面臨的壓力事件，特別是個人長期面臨壓力的情境下，社會支持的協助功能更為顯著。

學者（Cohen & Wills, 1985; Shumaker & Brownell, 1984; House, 1981）認為可將社會支持的效果分為「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和「緩衝效果」（buffering effect）。

（一）直接效果：藉由個人需求（例如：安全感、自尊、歸屬

感、情感等)的滿足，而直接提升個人的身心健康及幸福感，並減輕壓力對個人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社會支持的直接效果模式不論個人是否處在壓力的情境下，對個人均能產生正面的效果。

(二)緩衝效果：對於身處壓力情境的個人，經由社會支持的獲得，以減緩壓力對個人所造成的衝擊，間接對個人的身心健康及生活產生正面的效果。因此，當個人處於壓力的情境中，社會支持的緩衝效果模式具個人才具有意義。

Cohen 和 Wills (1985)認為社會支持和身心健康之間具有主效果模式(main effect model)和緩衝模式(buffering model)兩種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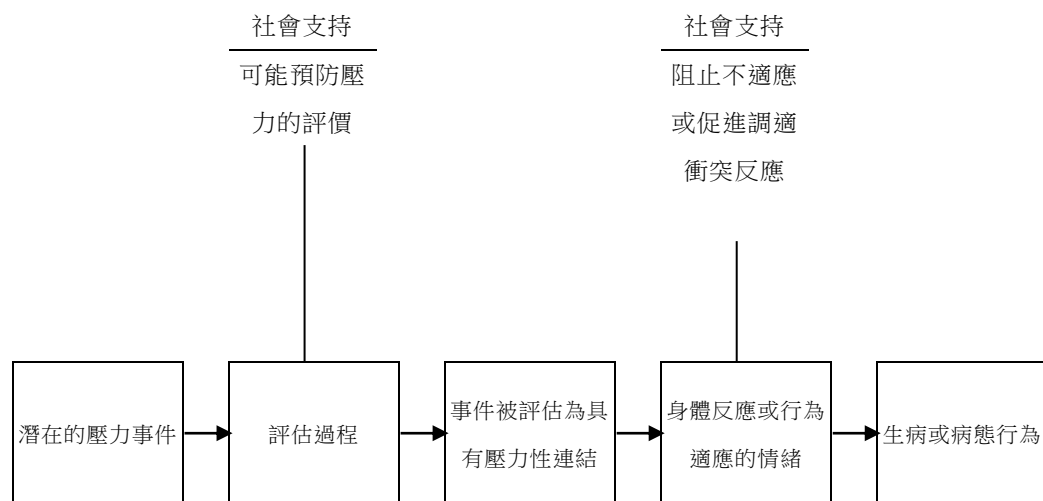
(一)主效果模式：不論是否處於壓力的情境中，社會支持均能夠直接降低個人面對壓力情境時的負向反應，而使其福祉感增加。

(二)緩衝模式：當個人處於壓力的情境中，社會支持能影響個人的認知評價系統而降低壓力對個人的威脅性，進而發揮緩衝(保護個人)壓力事件所帶來的潛在破壞性。

Cohen 和 Wills 認為緩衝效果所帶來的影響如下：

由上可知，社會支持的來源與個人的重要他人或親密他人有關。

另有著重支持型式的學者，則將社會支持的形式分為正式支持(formal support)與非正式支持(informal support)二類。Caplan (1974)對上述這兩種支持有較清楚的定義，並認為社會支持的來源可以結構化的分類為正式向度及非正式向度兩類，且功能各不相同：(一)正式支持：指經由組織(organization)本身高度的特質及特



圖二 社會支持的緩衝效果 (Cohen & Wills,1985)

殊目標，以提昇個別的福利，且被一些團體用來作有效的適應；(二)非正式支持：為一種更自然、無結構的支持，是一種個別化的需求和自然生物反應 (nature biosocial response) 所產生的型式。

綜合上述，社會支持的提供對於個體的生活適應，是有一定助益的。但是否代表提供愈多量的社會支持，

個體的生活適應愈好呢？Shinn、Lehmann 和 Wong (1984)曾指出，個人在遭逢重大變故時(如父母親去世)，獲得協助的量並不一定影響其適應的情況。真正影響個人生活適應情形的主要因素是由誰提供了這些協助，意即社會支持的「提供者」為何？不適當的支持來

源，有時反而會產生反效果。因此，在探討社會支持對婚姻關係中受虐婦女的影響時，除了強調社會支持量的多寡所產生的不同影響外，更不可以忽略社會支持提供者對受虐婦女所產生的不同影響。

伍、婚姻暴力與社會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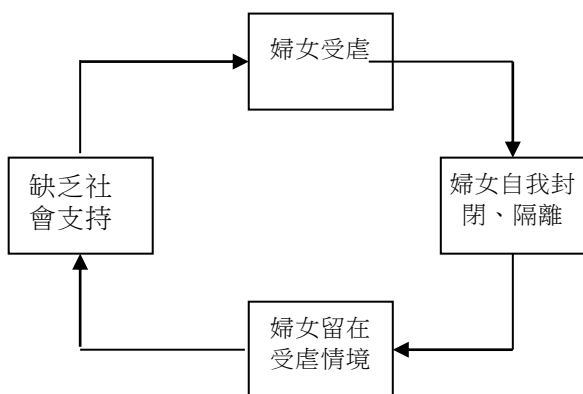
一、受虐婦女的社會支持

以往社會對於婦女在婚姻暴力中受虐的事件，大多抱以別人的「家務事」的觀念來因應之。為免遭受「池魚之殃」，上至警政系統，下至左鄰右舍，不敢也不願對受虐婦女伸出援手。

Walker (1979) 建議，有關婚姻暴力介入服務的第一個步驟，是去說服受虐者離開施虐者或切割與施虐者的關係，去尋求家庭及

朋友的支持。多數學者

(Coley & Beckett, 1988; Dutton, 1988; Dibble & Straus, 1980; Dobash & Dobash, 1979; Walker, 1979; Martin, 1976) 的研究指出，許多受虐



圖三 缺乏社會支持與婦女受虐的惡性循環
(轉引自周月清，民八四)

婦女仍停留在受虐的關係中，主要原因是因為缺乏一個有效的社會支持(引自周月清，民八四)。而這個原因，亦促使婦女受虐的情形，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模式。(見圖三)

準此而論，社會支持對受虐婦女而言是迫切需要的協助。另外，若能針對受虐婦女及其家庭提供一個有效之處遇服務，也有助於婦女受虐情形的改善。

Bowker (1984) 針對非正式性社會支持對受虐婦女的協助是否有效的研究中發現：(一)家人所提供的協助讓受虐婦女感到滿意；(二)法律的協助通常是有用的；(三)鄰居通常是最後的協助者；(四)朋友在婚姻暴力行為初次發生時，是僅次於家庭的第二個協助資源者；(五)女方的親戚總是受虐婦女主要要求庇護的地方，其次是朋友、鄰居，最後才是婦女資源中心。

此外，Bowker (1988) 另一個在威斯康辛州的研究，受虐婦女以個人的能力來減少或終止受虐的情形，比正式的支持系統無效。

根據此項研究的結論表示，四種最有效的支援是：婦女團體、庇護所、律師及社會服務或輔導機構(引自周月清，民八四)。

周月清(民八三)指出，Dobash 和 Dobash 於一九七九年的研究發現，受虐婦女往往認為向其父母、親戚求助是較為自然的事，而且也比較能迅速予以協助，因此較傾向對這些個人的社會支持網絡求助。然而這些非正式及正式的社會支持，是否對受虐婦女提供了相對的幫助呢？事實上，受虐婦女的非正式社會支持系統中，亦不乏對受虐婦女製造「二度傷害」的情形，父母、親友錯誤的刻板

印象，加深了受虐婦女對於自己受虐的錯誤認知，認為自己的受虐是因為自己妻子角色扮演不稱職、自己的婚姻不和諧等情形所造成。在這樣的情形下，婦女只好考慮轉向第三者求助，如專業的服務或醫療等機構，亦即正式的社會支持系統。因此，Gourash (1978) 表示，當受虐婦女轉向專業機構求助時，表示其已無法在其個人的社會關係中得到有效的支持。

Mitchell 和 Hodson (1983) 也曾對受虐婦女進行探索式的研究，分析有效的社會支持及面對壓力的處理方法是否間接受個人資源與壓力大小的影響。根據這些文獻探討結果，受虐婦女並不喜歡向正式的支持系統求助，很可能是這些婦女從未想到這些社會支持對她們是有益的，或根本不知道哪裡有這些專業服務的提供（引自周月清，民八三）。是否正式性的社會支持提供的適當性（availability）不存在？抑或不易取得、缺乏接近性（accessibility）？值得在建構社會支持時加以深思的問題。

根據上述，國內在對受虐婦女提供協助時，應跳脫只侷限於情緒安撫層面的協助，在鼓勵受虐婦女走出受虐的情境時，應同時主動提供完善且有力的支持性社會背景（supportive social context）。因此，如何連結正式與非正式支持系統（如圖四），提供受虐婦女有用且完善的社會支持，將是今後在受虐婦女處遇上所不可忽略的發展重點。

二、受虐婦女與社會支持需求

婚姻暴力的發生，與社會支持的有無存在著什麼關係呢？Gelles (1985) 指出，Gelles 於一九七六年曾提出三個有關受虐婦女是否離開施虐者的假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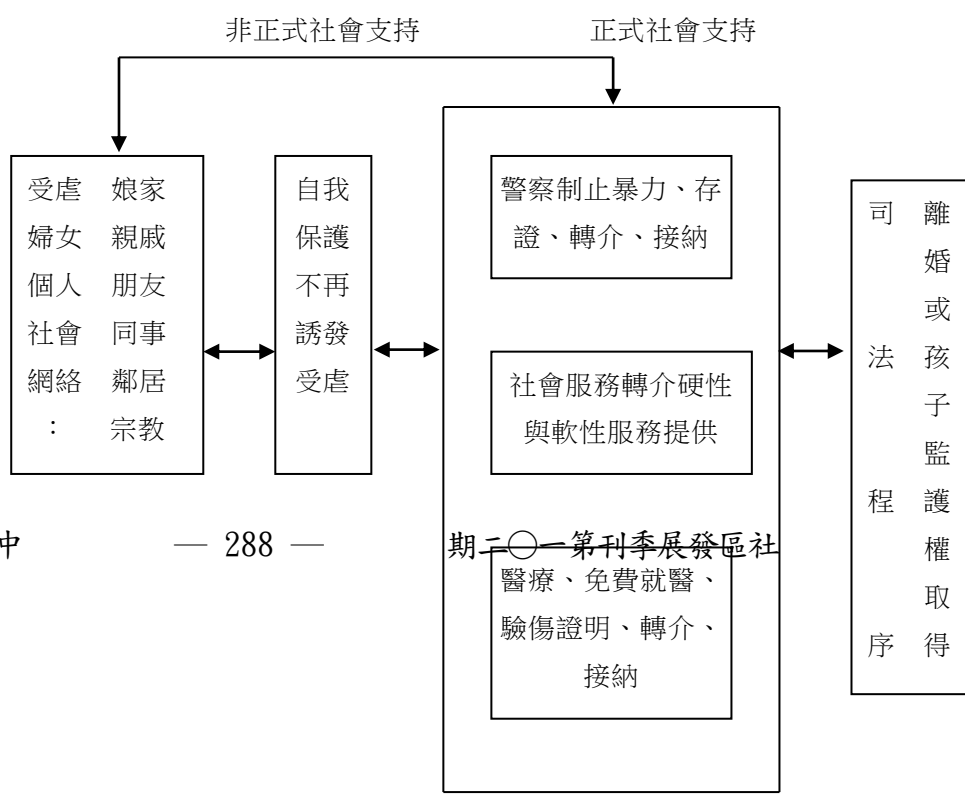
（一）幼年時代曾有被虐待或忽視經驗的婦女，愈可能持續受虐關係。

（二）社會資源與社會支持愈少的受虐者，愈可能留在受虐情境中。

（三）暴力傷害的嚴重性與頻率愈少，愈可能留在受虐情境中。

據上所述，婦女的持續受虐，與社會支持、社會資源存有一定的相關性。事實上，社會支持的缺乏及不接近性，是會導致虐待行為的惡性循環。許多的文獻也指出，缺乏「社會支持」是婦女不能

圖四 連結正式與非正式支持系統之受虐婦女服務架構圖（周月清，民八四）



終止受虐關係的主因。周月清（民八四）指出：「社會的隔離（Social Isolation）與家庭暴力的嚴重性存有極強的連結。」在婚姻暴力的情境中，婦女與外界的互動幾乎是斷絕的、隔離的，除了缺少機會去學習他人如何在行為上的自我增強（self empowerment）外，也無法與外界的訊息聯絡（例如：認識相同境遇的婦女、尋求協助等），所造成的結果是持續遭受施虐者的暴力傷害。

學者 Bowker（1984）、周月清（民八三）的研究均發現，受虐婦女在面臨婚姻暴力時所採用的求助情形，多以「非正式」的社會支持為主，只有少數受虐婦女會向正式支持系統求助。而且從 Bowker 的研究中也發現，受虐婦女對家人所提供的協助感到滿意，此外娘家親戚則是受虐婦女首先考慮的求助對象。值得一提的是，兩人均發現，受虐婦女處理婚姻暴力時，若有警察或法律系統的支持（介入），對於婚姻暴力的防治是最為直接、有效的。DuBow 和 Becker（1976）曾指出，當受虐婦女在使用資源以解決婚姻暴力問題時，有必要向法院提出告訴；而在接受諮商輔導、訴請離婚、或庇護所照顧時，亦都必須要有法治單位的介入。

Ford（1983）指出，當受虐婦女決定向法治單位求助時，不但因為迫切的需要，還要看她對於法治單位所提供的協助是否具有信心？而這信心則基於經驗（引自周月清，民八四）。事實上，當我們一再強調受虐婦女要勇敢的走出來、並尋求社會資源的協助時，更應該反觀社會支持的網絡（如：司法、醫療、警政、教育、社會福利等）是否能提供更專業、更強有力的支持性社會背景（supportive

social context）呢？當社會支持的服務內容不再停留在情緒的安撫、出庭的戒護，或是轉介、轉診時，取而代之的是主動以綿密的社會支持背景提供受虐婦女更細緻的處遇服務，方可期望有更多不幸的受虐個案走出受虐的情境。

陸、結語

婚姻暴力問題的定位，會影響到處遇服務提供的假設、方式、管道及內容。婚姻暴力絕非等同於個人或個別家庭的問題，而是整體社會所必須共同面對的議題，尤其在目前仍處於男尊女卑的年代中，婚姻暴力的本質更是一種性別權力不平等的結果展現。因此，婚姻暴力可說是整體社會所必須共同面對及承擔的問題。在跳脫「譴責受害者」或「譴責受害家庭」的迷思後，對於在婚姻暴力中的受害者所提供的社會支持，更應該擺脫單一面向的協助提供，並朝向一個「性別化」的社會支持路徑前進（註：婚姻暴力受害人不分性別皆有可能，因而「去性別化」的社會支持是未來發展目標。但觀諸實際發生狀況，目前的受害人仍多以女性為主，故筆者認為「性別化」的社會支持仍有其必要）。無論是民眾對婚姻暴力意識型態的轉變、社會支持網絡的建立（連結正式及非正式社會支持），均極需公私部門與全體民眾共同投入防治，方有助於提升婚姻暴力議題防

治之成效。

（本文作者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暨高雄市東光國小教師）

◎ 參考文獻：

- 丁雁琪（民八五）。美國婚姻暴力工作模式——由被虐婦女運動談起。福利社會雙月刊，五二，一三二—一二。
- 王淑芬（民八〇）。保護管束少年之生活壓力、社會支持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私立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工作組碩士論文（未出版）。
- 王麗容（民八四）。婦女與社會政策。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沈慶鴻（民八六）。婚姻暴力代間傳遞之分析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
- 呂寶靜（民八一）。如何結合社會資源加強婦女保護工作。加強兒童少年婦女保護工作省政業務研討會實錄，二七七—三〇三。
- 周月清（民八四）。婚姻暴力——理論分析與社會工作處置。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周月清（民八三）。臺灣受虐婦女社會支持探討之研究。婦女與兩性學刊，五，六九—一〇八。
- 高鳳仙（民八三）。美國家庭暴力法概觀。臺北：司法院（司法院八十一年度出國專題研究報告）。
- 陳若璋（民八三）。家庭暴力防治與輔導手冊。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陳婷蕙（民八六）。婚姻暴力阻礙受虐婦女脫離受虐關係的影響因素之探討。社會福利雙月刊，一三〇，四二—四八。
- 陳源湖（民八七）。高雄縣市婚姻暴力受虐婦女生活壓力、因應策略與社會支持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單小琳（民七七）。國中導師專業倦怠與工作壓力、社會支持、調適的相關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
- 黃怡瑾（民九〇）。婚暴中的權力控制——個人自覺與社會結構的互動歷程。載於婦女與兩性學刊，一二，九五—一三七。
- 黃富源（民八三）。警察系統回應婚姻暴力的理論與實務。臺北：內政部社會司、婦女新知基金會婚姻暴力研究計劃警政小組研究報告。
- 湯琇雅（民八二）。婚姻暴力中婦女受虐狀況與其因應過程之初探。私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鄭麗珍（民七七）。低收入單親女性家長的角色負荷和社會支持網絡之相關研究。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工作組碩士論文（未出版）。
- 劉秀娟（民八七）。兩性關係與教育。臺北：揚智。
- 謝臥龍（民八二）。被毆婦女之性別角色確認與自尊的研究——探討心理重建與教育策略。載於高師大成教中心主辦，特殊境遇婦女研

- Aguirre B. E.(1985). Why Do They Return? Abused Wives in Shelters. *Social Work*, 30 (4) :p.350-354.
- Bowker, L. H. (1984) . Coping with wife abuse: Personal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R. Roberts (Ed.) , Battered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 .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 Caplan, G. (1974) . Support systems. In G. Caplan (ED.) , Support systems and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New York : Basic Books.
- Carlson, B. E. (1984) . Causes and maintenance of domestic violence: An ecological analysis. *Social Service Review*, 58, 569-587.
- Cassel, J. (1974) . Psychosocial Processes and “Stress” .. Theoretical Formu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4(3),471-482.
- Cohen, S., & Wills, T. A. (1985) .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 (2) , 310-357.
- Cobb, S. (1976) .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of life Stres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38, 300-314.
- Dasgupta, S. D. & Warrier, S. (1996) . In the footsteps of “Arundhati”.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 (3) , 238-261.
- Dean, A., & Lin, N. (1977) . The stress-buffer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Problems and prospects for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65 : 403-417.
- Dibble, U., and Straus, M. A. (1980) . Some social structure determinants of inconsistency between attitudes and behavior: The case of family violen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2, 71-80.
- DuBow, F.L., and Becker, T.M. (1976). Patterns of victim advocacy. In W. F. McDonald (Ed.) ,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victim*. Beverly Hills: Sage.
- Dutton, D.G. (1988) . The Domestic assault of women Psychological and criminal justice perspectiv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Inc.
- Gourash, N. (1978) . Help-seeking: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6 (5) , 413-423.
- Hampton, R. L. Jenkins, P., & Vandergriff-Avery, M. (1999) . Physical and sexual violence in marriage. In R. L. Hampton (Ed.) , *Family violenc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2nd ed.) , 168-197.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enderson, S. (1977) . The social network, support and neurosis: The function of attachment in adult lif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1, 185-191.
- House, J. S. (1981) . *Work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Jerry L. Brinegar (1992) . *Breaking free from domestic violence*. Minnesota: CompCare Publishers.
- Pagelow, M. D. (1984) . *Family Violence*. New York: Praeger. Martin, S.C. (2000) . *Violence, Gender, and Intemperance in Early National*

Connecticut.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4 (2) , 309-325.

Martin, S.C. (2000) . Violence, Gender, and Intemperance in Early National Connecticut.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4 (2) , 309-325.

Martin, D. (1976) . Battered wives. San Francisco: Glide.

Rude, D. (2000) . Reasonable Men and Provocative Women: an Analysis of Gendersed Domestic Homicide in Zambia.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5 (1) , 7-27.

Schechter, S., & Ganley, A. (1995) . Understanding domestic violence.

In *Domestic violence: A national curriculum for family preservation practitioners*. San Francisco: Family Violence Prevention Fund.

Schaefer, C., Coyne, J.C., & Lazarus, R. S. (1981) . The health- related functions of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4,381-406.

Shinn, M., Lehmann, S., & Wong, N.W. (1984) .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0 (4) , 55-76.

Shumaker, S. A., & Browenell, A. (1984) .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Support: Closing conceptual gap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0 (4) , 11-36.

Thoits, P. A. (1982) . Conceptual,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studying social support as a buffer against life stres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3, 145-159.

Walker, L. E. (1984) . *The battered women syndrome*. New York:

Springer.

Walker, L. E (1979). *The Battered Woman*. New York: Harper & Row.